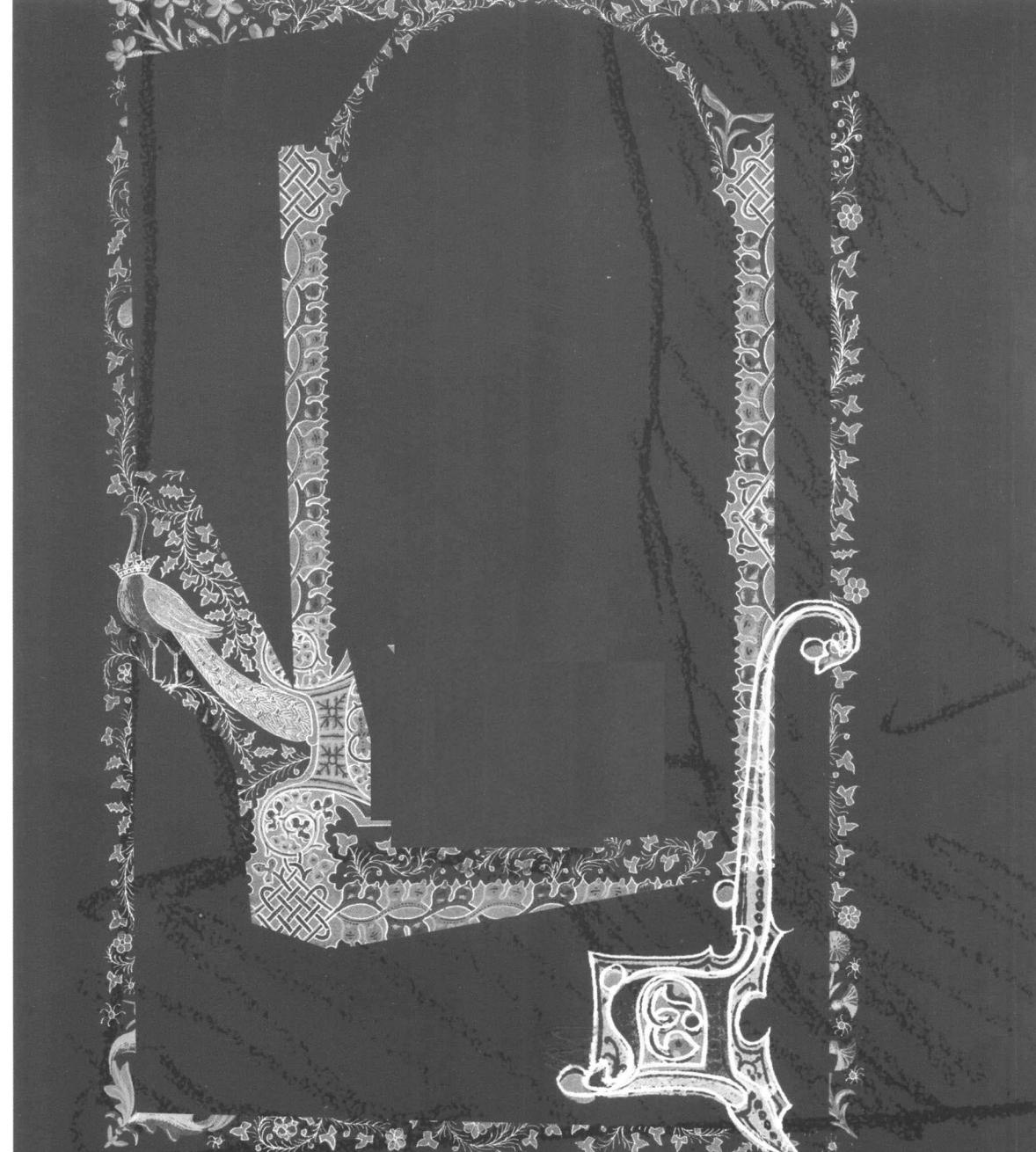


钱理群 《我们需要鲁迅》
李 灿 《国难中尴尬的外交家》
李国文 《乾隆二三事》
朱增泉 《彭大将军》
南 帆 《戊戌年的制刀》

随笔

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

版社



2006 中国年度隨筆

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

◆ 漢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6中国年度随笔/杜渐坤, 陈寿英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7.1

(2006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3818-1

I .2… II .①杜… ②陈… III .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51033号

2006中国年度随笔

选 编 杜渐坤 陈寿英

责任编辑 文龙玉

美术编辑 石绍康

责任校对 田 芳 徐 明
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元君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821573 2863978

传 真 0773-2821268 2802018

邮购热线 0773-2821573

电子信箱 ljcb@public.glne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720×980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80千字

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3 000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3818-1

定 价 24.80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卷前小语

鲁迅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。幸亏有了鲁迅，才形成某种张力，在我们这个浮躁、空谈的时代，我们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“苦工”。《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》彭德怀的一生，是一部辉煌而悲怆的命运交响曲，背景宏大、主题强烈，大起大落，撼人心魄。《彭大将军》你知道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是谁？——清朝的乾隆皇帝。《乾隆二三事》

编选者从《随笔》、《读书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美文》、《书屋》等数十种品牌报刊中，精心挑选王蒙、李元洛、钱理群、陈忠实、陈丹青等40多位作者的40多篇随笔佳作，使本书保持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。

在秉持随笔特有的思想锋芒和问题意识的同时，力求从历史反思和本土社会现象中寻找思想资源，成为2006年随笔作品的最大亮色，也是本书最具价值之处。

2006中国年度作品系列

2006中国年度中篇小说
2006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2006中国年度诗歌
2006中国年度散文
2006中国年度杂文
2006中国年度随笔
2006中国年度散文诗
2006中国年度小小说
2006中国年度微型小说
2006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2006中国年度故事
2006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2006中国年度童话
2006中国年度少年作家作品
2006中国年度幽默作品
2006中国年度优秀小学生作文
2006中国年度优秀初中生作文
2006中国年度优秀高中生作文

中国名刊2006年度佳作系列

《萌芽》2006年度佳作
《新周刊》2006年度佳作
《中学生阅读》初中版2006年度佳作
《中学生阅读》高中版2006年度佳作

目 录

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	钱理群 (1)
鲁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	陈丹青 (6)
我们敢不敢站在孔子肩膀上	张心阳 (11)
重思百年“国民性”论述	伍 国 (14)
北洋大学一百一十年祭	张晓唯 (29)
铁路与政争	雷 颀 (38)
——以李鸿章修铁路为例	
国难中尴尬的外交家	李 辉 (46)
——1931年中国的回顾	
远东审判六十周年祭	苏智良 (53)
雾里观花 知日百年	李兆忠 (60)
并非“陪审”的陪审团制度	陈 伟 (72)
说政治	吴 江 (83)
戊戌年的铡刀	南 帆 (86)
民国首脑们的诗	毛 翰 (99)
话说张学良	王充闾 (119)
彭大将军	朱增泉 (137)
最后的潼关：一份迟了67年的采访手记	诺 思 (154)
乾隆二三事	李国文 (168)
读“高祖还乡”的联想（外一篇）	章 明 (175)
怎一个愁字了得（外三篇）	熊召政 (180)
唐朝，那朵自由之花	李木生 (191)

- 《红楼梦》与现代文论 王蒙 (200)
——在深圳大学的一次演讲
- 黄钟大吕 李元洛 (214)
——元曲之旅
- 朱元璋往事 李亚平 (221)
- 不许做诗 张大威 (242)
- 大师从这里走来 阎纲 (247)
- 今天的遗憾和慨叹 张炜 (254)
——在上海大学的演讲
- 俄狄浦斯的灵魂 杜高 (267)
- 汪铭竹：从两本书读一个诗人 邵燕祥 (273)
- 陪一个人上原 陈忠实 (283)
- 另一个八十年代 李陀 (288)
- 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葛兆光 (295)
- 饥年旧事 金翔 (304)
- 底层手稿·贫困之城 吴亮 (310)
- 有感于六“养”式的文学 毛志成 (316)
- 京城速写 肖复兴 (321)
- 四个简短的故事 白桦 (327)
- 独饮 从维熙 (331)
- 造物与制作 詹克明 (334)

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

钱理群

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？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。一位同学告诉我，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《鲁迅》，非常感动。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，能拍成这样，是很不容易了。在拍摄过程中，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，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，即强调鲁迅“兼有‘儿子’、‘丈夫’、‘父亲’、‘导师’、‘朋友’等几重身份”，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，着重从日常生活中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。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，觉得亲切而感人，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，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。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，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，于是，就有了这样的疑问：“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，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：鲁迅是一个好儿子，好丈夫，好父亲，好朋友吗？”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：历史与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，好父亲，好丈夫，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？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：鲁迅对于现代中国，对于我们民族，特殊的、仅仅属于他的、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？

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并不是无的放矢，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、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：在将“鲁迅凡俗化”的旗号下，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。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、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。

幸亏有了鲁迅，才形成某种张力

是的，鲁迅和我们一样：他不是神，是人，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。

但，鲁迅又和我们，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：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。因此，我们才需要他。

强调这一点，并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，重新把他看作是“方向”，“主将”，“导师”——这些说法，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的真正特别之处。

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“主将”，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，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、文化运动，他都是既支持、参加，又投以怀疑的眼光。

鲁迅从来就不是，也从来没有成为“方向”，他任何时候（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）都不可能成为“方向”，因为他对任何构成“方向”的主流意识形态，以至“方向”本身，都持怀疑、批判的态度。

而且，鲁迅还向一切公理、公意、共见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。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“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”，断定“不管哪个朝代”，鲁迅“恐怕都是坏公民”，这是确乎如此的。鲁迅就是一个“好的怀疑主义者”和“坏的公民”。

鲁迅也不是导师。从古代到现代，到当代，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“导师”和“国师”情结，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。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。他在著名的《导师》一文里说，知识分子自命导师，那是自欺欺人，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。但他又说，我并非将知识分子“一切抹杀；和他们随便谈谈，是可以的”。在我看来，他也这样看自己：他不是“导师”，今天我们读者，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，那就找错了人。鲁迅早就说过，他自己还在寻路，何敢给别人指路。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“随便谈谈”，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。是“思想的启迪”，和我们一起“寻路”，而非“行动的指导”，给我们“指路”。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。

而鲁迅思想的特别，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，是他独有的。

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？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“不是”——不是“主将”，

不是“方向”，不是“导师”，就可以看出，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、话语结构中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，始终是少数和异数。

他和以充当“导师”、“国师”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，就在于他从不看重（甚至藐视）社会、政治、思想、文化、学术的中心位置，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，他愿意“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飞沙走石，乐则大笑，悲则大叫，愤则大骂”（《〈华盖集〉题记》），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。当然，他更深知，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，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，他甚至说，这是“伪自由”。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。

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“正统”、“道统”，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，这样的“好的怀疑主义者”，这样的体制外的、边缘的批判者，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，幸亏有了鲁迅，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，才形成某种张力，才留下了未被规范、收编（这里所说的“收编”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，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，也指文化，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）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。

今天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“苦工”

那么，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、异数，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

首先，它是一个检验。我非常同意王乾坤先生的一个意见：能否容忍鲁迅，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、健康度的一个检验。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，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（其中居然有“宽容”的旗号）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，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，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“老谱袭用”，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，不是为鲁迅，而是为我们自己。

当然，任何时候，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，始终是少数。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，就不是鲁迅了。我曾在《与鲁迅相遇》里说过：“人在春风得意、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，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，人倒霉了，陷入了生命的困境，充满了困惑，甚至感到绝望，这时就接近鲁迅了。”换一个角度说，当你对既成观念、思维、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，或者成了习惯，即使读鲁迅作品，也会觉得别扭，本能地要批判他，拒绝他；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，习

惯了的常规、常态、定论产生不满，有了怀疑，有了打破既定秩序，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，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，那么，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、表达，就会感到亲切，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。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。他是另一种存在，另一种声音，另一种思维，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。

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，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，特别之处，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。因此，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，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、开放的过程中，这样，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。也就是说，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，一边辩驳的。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、观念辩驳，也和鲁迅辩驳，辩驳的过程，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。在鲁迅面前，你必须思考，而且是独立地思考。正是鲁迅，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，激发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。他不接受任何收编，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；相反，他期待，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、独立创造的人——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。

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。他的前述边缘的、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，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，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“被侮辱和被损害者”这一边，为他们“悲哀、叫喊和战斗”。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。同时，他又怀着“立人”的理想，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，对人的奴役，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，因此，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，因而是“永远的批判者”。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。鲁迅曾提出一个“真的知识阶级”的概念，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：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，是永远的批判者（《关于知识阶级》）。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。这样的“真的知识阶级”的传统，在当下中国的意义，是不言而喻的。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

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，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，没有建设。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，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，是20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，在我看来，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积累而呕心沥血。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。鲁迅早就说过：“我已经确切的相信：将来的光明，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。”（《〈引玉集〉后记》）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。早在20年代，他就提倡“泥土”精神，提出“不要怕做小事业”（《未有天才之前》）。直到1936年去世

之前，他还呼吁“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”（《致欧阳山、草明》）。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“苦工”，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，他就以重病之身，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《花边文学》、《故事新编》，翻译《死魂灵》第二部，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《海上述林》，编印《〈城与年〉插图本》、《〈死魂灵〉百图》、《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，还参与编辑《海燕》、《译文》等杂志。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、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，但他生命的意义，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、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。这倒是显示了鲁迅“平常”的一面。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，比作是“农夫耕田，泥匠打墙”（《徐懋庸作〈打杂集〉序》），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。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，也是他的伟大之处。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、浮华、空谈的时代，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“苦工”。

（选自《同舟共进》2006年10期）

鲁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

陈丹青

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，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，后来研究鲁迅的人“斤斤计较”，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“核对”鲁迅的思想。

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。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，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。按照胡塞尔的定义：“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。”鲁迅的性格、主见，不管哪个朝代，恐怕都是“坏公民”。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，恐怕不多了吧。

然而全中国专门研究鲁迅，吃鲁迅饭的专家，据说仍有两万人。所以要想比较认真地谈论鲁迅，先得穿越两万多专家的几万万文字，这段文字路线实在太长了。

我知道自己是属于在“鲁迅”这两个字上“落了枕”的人，我得找到一种十分私人关系才好开口谈鲁迅。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么私人关系呢？说是读者，鲁迅读者太多了；说是喜欢他，喜欢鲁迅的人也太多了；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读者，都有人喜欢，那不是谈论鲁迅的理由。我只能说，鲁迅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。我指的不是“想到”（thinking），而是“想念”（miss）。

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

我们这代人喜欢鲁迅，其实是大有问题的。我小学毕业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市面上能够出售、准许阅读的书，只有《毛泽东选集》和鲁迅的书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块大牌坊。这是另一个大话题，今天不说。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，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，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。其实，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，住在弄堂里，“浑身痱子，一声不响”，也有许多人讨厌他。我就问自己：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？我喜欢看他的照片，他的样子，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。

“文革”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，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，当然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“鲁、郭、茅、巴、老、曹”之类。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——平心而论，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冰心的模样，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。近20多年来，胡适之、梁实秋、沈从文、张爱玲的照片，也公开发布了，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，尤其胡适同志，真是相貌堂堂，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，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？

可是我看来看去，看来看去，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。

五四那一两代人，单是模样摆在那里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。前些日子，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，发布了陈公博、林柏生、丁墨邨、褚民谊押赴公堂，负罪临刑的照片——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，他们一个个看起来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、书生相貌的脸。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，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。他穿件干净的长衫，瘦得一点点小，可是那样地置之度外、斯文通脱。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，一看之下，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。

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，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。这张脸非常不买账，又非常无所谓，非常酷，又非常慈悲，看上去一脸的清苦、刚直、坦然，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……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，就那么对着镜头，意思是说：怎么样！我就是这样！

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配他，配他的文学，配他的脾气，配他的命运，配他的地位与声名。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，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，可

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，你能想像么？

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，那么瘦弱，穿件长衫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。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，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，便是致命的错误。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、张群那样的长胡子，或者像吴稚晖、沈钧儒那样光脑袋，古风倒是有古风，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，不像他。他长得非常的“五四”，非常的“中国”，又其实非常摩登……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，何其摩登，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：胡适之、徐志摩、邵洵美……鲁迅先生的模样既非洋派，也不老派，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。

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，即称赞他好样子，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：早年的样子还要好。这不是鲁迅会讲话，是他看得起萧伯纳，也看得起他自己。

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？是的，在最高意义上，一个人的相貌，便是他的人。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，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。自己说说而已。

鲁迅与“论敌”：半数是熟人和朋友

老先生去世，整70年了。70年来，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、勇士、先驱、导师、革命家，说他是愤怒激烈、嫉恶如仇、是“没有半点媚骨的人”；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、不知宽容，是睚眦必报、有失温柔敦厚的人。总之，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，都肯定鲁迅是个很凶、很严厉、不通人情的人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不是总在猜测鲁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会怎样么？阿弥陀佛，还是将鲁迅放回他诅咒的时代吧。在他的时代，他可以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抽烟，成天价寻思怎样做一个所谓胡塞尔的“坏公民”。据说，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怎样滋味，可见他预备吃苦头。最著名的例子，是他去杨杏佛追悼会，出门不带钥匙，打算横竖死了算了。然而他到底从未挨过打、挨过整，没在班房里蹲过一天。我们老是渲染他怎样避难、逃亡，哪晓得那正是鲁迅的奢侈与风流……鲁迅属蛇，蛇最会逃，逃在租界里。

总之，鲁迅的时代，英雄豪杰爱国志士，多了去了，只不过50多年来，许多民国人被我们贬低了、歪曲了、抹掉了、遗忘了……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

育中，万恶的“旧社会”与“解放前”，除了伟大的共产党人，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。鲁迅一再说，他只有一支笔，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，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……

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？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。

最近我弄到一份40多年前的内部文件，是当年拍摄电影《鲁迅传》邀请好些文化人做的谈话录，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，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。我看了有两点感慨，一是鲁迅死了，怎样塑造他、修改他，全给捏在官家手里；什么要重点写，什么不能写，谁必须出场，谁的名字不必点，等等。这可见得我们知道的鲁迅，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涂改捏造出来的。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，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，而是非常诙谐、幽默、随便、喜欢开玩笑，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邦邦。夏衍，是鲁迅先生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，他也说老先生“幽默得要命”。

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，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，名字叫唐弢。唐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看见市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、苦相，私下里对他外甥说，哎呀，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。他说，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，兴致好时，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，一路转到桌子前，一屁股坐在桌面上，手里端支烟，嬉笑言谈。唐弢还说，那时的打笔仗，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，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，我也讲讲，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，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，照样谈笑。前面说到的夏衍，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，结果据夏衍说法，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聊天，熟得很。

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。胡适算是鲁迅的“宿敌”，可是你看鲁迅给胡适早年的信，虽敬而远之，不作熟腻之态，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。

这样看来，鲁迅与所谓“论敌”的关系，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。不熟不识的人，又怎样看待鲁迅呢？我的一位师尊认识某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，50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，鲁迅回应几句，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说：“好哉，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我们的历史教育、历史记忆——假如我们果然有历史教育的话——都是严重失实、缺乏质感的。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，另一面却是给藏起来，总是

不在场的。我们要还原鲁迅，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。我说“尽可能”，因为我们的“历史”常是哈哈镜，变了形的。我们要学会在“变形”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“形”。

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，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“好玩”的一面。譬如章衣萍的太太回忆，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，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，于是隔着马路喊，鲁迅没听见，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，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！于是老先生“噢、噢、噢……”地噢了好几声，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，鲁迅笑说，你不是叫我好几声么，我就还给你呀……接着进屋吃栗子，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，味道好，鲁迅应声道：“是的，人也是小的好！”章太太这才明白他又在开玩笑，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。

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，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，我来插一脚，又是不好玩。倒是胡兰成接着说，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“斤斤计较”，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“核对”鲁迅的思想，这“核对”一句，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。

鲁迅先生还有另一层迷人的底色，就是他一早便提醒我们的话。他说：他内心从来是绝望的、黑暗的、有毒的。他说的是实话。

好玩，然而绝望；绝望，然而好玩。这是一对稀有的、高贵的、不可或缺的品质。由于鲁迅其他深厚的品质——正直、刚烈、近于妇人之仁的同情心——他曾经一再欣然上当：上进化论的当、上革命的当、上年轻人的当、上左翼的当，许多聪明的、右翼的正人君子因此而攻击他、贬损他，可是鲁迅都能逃脱，都能随即看破而道破，因为他内心克制不住地敏感到黑暗与虚空，因为他克制不住地好玩。

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远远高于他的五四同志们，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够企及他，掩盖他，超越他。然而鲁迅这种罕见的特质，说来并不见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——在我们任意夸张而援引的那位鲁迅身上，偏偏被排除了“绝望”与“好玩”这两样特质。

有朋友会问：鲁迅怎么算好看呢？怎能用好玩来谈论鲁迅呢？这是难以反驳的问题，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问题。这问题的可能的答案之一，恐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、这个世代的中国文学，越来越不好看，也不好玩了。

（选自《同舟共进》2006年10期）